



從次文化研究到後次文化研究——談西方次文化研究的演變及其在教育上的啟示

● 方永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本文主要目的在引介當代西方學界對於青少年次文化研究的最新趨勢。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從美國的芝加哥學派到英國伯明罕學派（研究基地為當代文化研究中心，簡稱CCCS），向來即是文化分析中的一項重要主題。不過到了1980年代及1990年代之後，西方學界受到後結構主義及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加上時代及社會環境的變遷，產生了不同於CCCS的次文化研究的取徑。基本上，後CCCS的研究取徑並未定於一尊，某些學者將其統稱為「後次文化研究」。在本文中，作者歸納了「後次文化研究」所具有的一些特徵，並借用了Besley的觀點說明當代青少年文化具有「混種」及「全球化」的特色，最後並闡釋了後次文化研究對於教育工作者所帶來的一些啟發。

關鍵詞：次文化、文化研究、後次文化研究、全球化、後現代主義



The Development of Post-Subcultural Stud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to Education

● Yung-Chuan F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introduce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adolescent or youth subcultures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ety. In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meaning and content of youth “subcultures” has undergone a rapid and total transformation, in keeping with the changes in society brought about through globalizati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The youth (sub)culture has thus changed into a “hybridized” and “globalized” culture (in Besley’s phras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postmodern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many contemporary scholars focusing on the study of youth cultures have suggested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sub-cultural studies called “post-subcultural studies.” Here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and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conception of “post-subcultural studies,” and explicates its implications for Taiwanese society.

Key words: subculture, cultural studies, post-subcultural studies,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poststructuralism



壹、前言

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相較於其他的專業人員，最幸運之處是在於他所面對的對象多半是朝氣蓬勃、日益茁壯的青少年或青年，這使得教師即便埋首於辛勤的工作之中也仍能常保青春，不易變老。但是相對來說，由於青少年的生命正邁向高峰，他們代表了下一代即將到臨的新文化，他們往往具備了獨特的青少年／青年（adolescence/youth）文化或是次文化（sub-culture），而這種文化與教師所代表的舊文化或成人文化之間有很大的差距。身為與青少年長時間相觸的第一線工作者，教師必須每天面對青少年文化的衝擊，即便其不認同青少年的次文化，但是他也必須正視青少年次文化的存在現實甚至價值。

簡單說來，所謂次文化指的是較小團體或次級層級的文化，它基本上來自大團體的文化（母文化，parent-culture），次文化與大（母）團體的文化有關，卻又有

自己一套的特殊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而次文化之所以與母文化之間有著不同，主要是由於地域、種族、年齡、階級等因素的差異（陳奎熹，1997：231-232）。有關次文化的定義，還有其他不同的角度。例如Peter Brooker即從次文化與主流文化之間的關係來定義次文化，其認為次文化構成主流文化的對立部份。Brooker認為次文化係由緊密或鬆散的群體構成，包含了分享一組共同利益、價值、品味及經常是專門知識或行話的人；他們追求共同的、儀式性的言行或消遣；他們可能藉由物質客體、配備、服飾或共同的「外觀」，來表達他們的團結；他們也可能因為和某個特殊實質區域、都市空間或集合地點的關係，而為人所知（王志弘、李根芳譯，2003：366）。

從不同的對於次文化的定義看來，次文化之產生固然有地域、種族、階級、年齡等不同因素的差別，然而次文化之所以形成，主要還是由於某些特定團體其成員之間關係或「溝通網路」要較之和其他團

青少年／青年（adolescence/youth），雖然包括不同的兩種年齡範疇，不過兩者之間的界限其實是相當模糊的，特別是兩者的畫分常隨不同的時代、社會習俗等因素而有所不同，我們只能從生理學上確定說青少年是開始於個人的性成熟，而在現代社會中，所謂的年輕人（young adults）其年齡層卻有愈來愈晚的趨勢，最近的不少文獻中（包括WHO）都將其概念延伸至廿四歲，因此過去所謂的「青年」，放至現代社會來看時，可能尚處於「青少年」的階段。有些學者如Besley（2003），則認為「青少年」通常使用於心理學的討論中，至於「青年」則常見於社會學的討論中。是以在本文中，將不嚴格區分何為青少年文化與青年文化，有時會有混用的情形，甚至更多時候是以青少年文化一詞，代表英文中的「youth culture」。



體成員間關係更為緊密或發達之故。因為處於同一個地域、種族、年齡或階級，成員彼此之間會有著較多的休戚與共之一體的團結感，而且也易產生共通的溝通語彙或方式，進而能在物質形式與外觀上生成某些「共同性」，以標示出「我們是同一國」的意涵。

在現代的社會中，探討與次文化有關係的議題，固然地域、種族、階級的差異仍是不容忽視的主要因素。然而其中年齡的差異，可說是普遍地存在人類每一個社會當中，年齡所帶來的文化差異也往往是最為明顯的，例如所謂青少年或青年次文化，就是出於年齡因素而產生的次文化。而以年齡差異為主的次文化研究，向來就為許多文化理論家所關注，其中特別是青少年次文化。例如，在英國所出現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就十分關注戰後音樂、時尚，以及青少年間彼此關連的世界，或是青少年與勞動之間的關係（王志弘、李根芳譯，2003：366；Hebdige, 1979；Willis, 1979）等與相關問題。而在O'Sullivan等人所著的《傳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的工具書中，亦認為「次文化」這個術語及許多支持它的理論，都幾乎用它來研究和詮釋青年人，其中尤其是「異常」青少年的研究（楊祖珺譯，1997：390）。

過去有關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多半認為其對於以成人文化為主的社會，常會形成「抗拒」或「對立」的關係。例如根據我國學者李亦園的研究，青少年次文化往往具有下列幾種特徵：（一）對形式主義的反抗；（二）對機械化的生活不滿；（三）對功利商業主義的抗議；（四）自我表現的趨向（李亦園，1984）。而在有關青少年次文化的描述中，我們不乏常可以看到「抗拒」、「不滿」或是「抗議」等字眼；也就是面對著主流意識型態或是成人文化的「壓制」，青少年容或無法進行強有力的反抗，但他們仍可以選擇另類及抗拒的方式來表達自己不同於主流社會及成人世代的「身份」。這也使得青少年次文化因而通常具有某種「反社會」、「反主流」的色彩，也更增添了青少年次文化對於一般學者的吸引力。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代社會中，這種以青少年為主的次文化，卻產生了內涵上的變化。固然大體上它仍維持了追求自我、強調與成人文化的差異的精神；但在傳播媒體（包括大眾傳媒與網路科技）高度發達的情形下，加上在當代的資訊社會中，因著年齡或世代差異所導致「媒體運用能力的差距」，進而產生所謂的「數位代溝」，都使得新世代的青少年更易形成一種迥然不同於上一世代父母和教師的價值觀念與行為模式。另外，尚加上現代



資本主義的繁榮、跨國企業經濟體制等因素的出現，遂使當前社會之青少年次文化更具有了與「流行文化」(popular culture)結合的意涵。面對著當代社會中青少年的次文化，我們似乎不能再將其單純地視為與成人或主流社會文化對立的一種文化，而應該以新的眼光來審視青少年次文化所具備的新內涵。

準此，本文撰寫主要的目的，即在分析西方社會當代次文化研究的演變情形，其中特別是1980年代後學者們對於青少年次文化問題的重新思索，此外也將進一步介紹在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想所影響下而產生的所謂「後次文化研究」(post-subcultural studies)。儘管「後次文化研究」在目前還無法真正自成一派，然而，作者依舊認為後次文化研究中還是有不少的觀點，可以提供給國內的教師或教育工作者許多的啟發。

貳、次文化研究與CCCS的關係

二次大戰後，西方世界的一個重要的文化特徵，就是興起了各式各樣的音樂形式、流行風尚、閒暇活動、舞蹈及和許許多和青年人有關連的語言(Barker, 2000: 318)。面對著這種新穎的文化及社會環境，不少文化理論學者開始改弦更張，將

文化的意義「再概念化」(re-conceptualizing)，認為文化的意義不應只包括精緻的高雅文化(higher culture)在內，一些較屬於平民大眾的「通俗文化」或「流行文化」其重要性也應該予以正視。在這樣的思想氛圍及社會背景下，1970年代在英國的伯明罕(Birmingham)出現了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根據Cohen的說法，CCCS的出現，代表了「新次文化理論」(new subcultural theory)的興起(Cohen, 1987: iii)。CCCS的文化研究學派之所以重視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除了前述對於文化概念的體認外，有很大的原因也是與從CCCS所培養出來的研究學者，如Hebdige, Clarke, Cohen, McRobbie, Willis及Grossberg等人皆是屬於戰後嬰兒潮的搖滾世代(babyboomer rock generation)有關。因為包括Hebdige等在內的這些學者，青年文化就是他們本身的文化，是以當他們在面對到那些高雅文化的輕視時，自然地將青年文化視為流行文化的一部份而予以正視(Barker, 2000: 318)。

基本上，在有關文化及次文化的研究上，CCCS可說是開啟了一個理論的空間，使得我們有關於邊緣性社會組成(peripheral social formations)及其文化實踐的研究成果得以更為豐碩(Stahl, 2003:



28)。而在對於次文化的研究上，CCCS也發展出不同於傳統美國次文化研究的取徑，這些取徑包括功能主義的脫序理論（functionalist anomie theory）及芝加哥學派（Chicago School）的研究（Martin, 2002: 74-75）等。包括過去美國及英國對於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都可以說是當代次文化研究重要的理論傳統（Wilson, 2002: 376）。不過CCCS不僅正視青少年次文化的重要性，也開創了不同的次文化研究取徑，更獲致了相當豐富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將CCCS對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特色作下列的歸納：

（一）在研究的方法上，CCCS使用的是民族誌的（ethnographic）的方法與馬克思主義式的分析，其研究的對象則是針對英國在二次大戰後的青少年文化與次文化進行分析。在當時，青少年常被視為是一個社會問題，但又同時在生活型態（lifestyle）和價值觀上反映了不小的社會變遷（Besley, 2003: 156）。

（二）透過「霸權」（hegemony）的概念，CCCS形塑了不同的「次文化」概念。CCCS的成員包括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與Dick Hebdige等人都使用了Gramsci的霸權概念，來解釋英國在二次大戰後所出現的一連串青少年文化風格（cultural styles），並將其視為引人側目的（spectacular）抗拒象徵（symbols of

resistance）。他們認為這種抗拒象徵實質代表了廣泛，但又潛藏的異見（dissent）。受到霸權觀念的影響，CCCS的次文化研究特別注重意識型態、社經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與文化之間的互動，將勞動階級的青少年男性視為是對抗宰制階級與成人中產階級的代表（Besley, 2003: 156-157）。惟後來有許多次文化的學者卻批評前述CCCS對於青少年次文化的看法過於浪漫（romanticism），而將CCCS的次文化學說稱為「英雄的」模式（“heroic” CCCS model）（Weinzierl, etc., 2003: 4-6）。

（三）對於「風格」（style）的強調。Hebdige曾批評了過去青少年次文化研究過分強調不同世代間的代溝，而主張應將研究焦點放在建構青少年次文化認同的風格和生活型態（lifestyle）上（Besley, 2003: 156）。「像熱內（Genet）一樣，我們所感興趣的是次文化——那些非主流團體的表意形式及儀式……它們或被輕視、或受譴責和正典化；不同時候受不同對待，有時被視為公共秩序的威脅，有時則被當成無害的小丑。」（Hebdige, 1979: 2）在CCCS的研究中，出現許多與青少年族群有關的名詞一如teddy boys、bodgies、widgies、mods、rockers、punks、skinheads、Rastafarians、hispters、beatniks、hippies、hip hoppers、



rappers、surfies、homies及metallers 等—這些字或因其特有的服裝風格，或因其獨特的行事方式或音樂類型而得名。基本上，CCCS認為各種不同的「風格」，可以提供青少年次級團體的凝聚力，並產生了有關行為類型的特有意象，卻因而常被成年人視為是反叛的、負面的甚至暴力的（Besley, 2003: 156）。在CCCS的眼中，「風格」就是一種抗拒的形式（a form resistance）（Stahl, 2003: 27）。簡言之，在次文化的研究方面，CCCS仍是屬於現代性中新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脈絡，它承認在宰制模式下會產生被動性的順從，但它更強調次文化對於記號的主動吸納及轉變，其中這種主動的過程是透過「拼湊」（bricolage）這種顛覆性的行動而進行，故「拼湊」也成為一種抗拒的形式（Muggleton, 1997: 192）。

以Phil Cohen一篇頗重要的CCCS研究文獻（Cohen, 1972）來看，CCCS說明了勞動階級的青少年次文化是如何對於傳統勞動階級社區的解體（因著戰後新發展與重新安置的政策而發生）作出回應。而青少年次文化所從事的是符號性的活動，他

們是以符號象徵來表達解決隱藏在其母文化中未獲解決的矛盾。亦即是，勞動階級的青少年次文化透過「風格」來達到這樣的作為。Cohen在其報告中，又舉了摩德風（mod style）為例來說明，青少年是如何藉此風格「想要去實現，但是是以一種想像的關係，在社會中流動之白領勞工的生存條件」（Cohen, 1972; cf. Martin, 2002: 75）。而在CCCS另一本經典的著作《透過儀式來進行抗拒》（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Hall & Jefferson, 1976）的標題裡，似乎也可看出青少年是透過儀式、風格等象徵性演出，進行對於主流文化的某種程度的反抗。

固然CCCS在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中頗有建樹，同時也喚起了後續學者對於此一領域探究的興趣，不過CCCS的次文化研究中似乎仍存在著一些缺陷，而且隨著時代及社會的改變，現今青少年所處的次文化處境其實已迥然不同於當時戰後的英國社會，致使CCCS的研究成果無法全然適用於當代的英國社會與其他的國家之中，這種限制讓CCCS的研究亦引發不少學者的批評，有關於這一些不同意見與評

這些字的中譯名詞因有文化上的差異，為恐無法傳神，故筆者暫不譯出，部份後文有提到者再一一翻譯。

Mod style，來自modern style的縮寫，源於1950年代的英國，當時英國青少年所崇尚的乾淨簡明、充滿現代感的時尚風格。當時mod style最經典的裝扮，就是男生一身剪裁貼身的義大利西裝，騎著小綿羊摩托車，女生則穿著迷你裙再加上高跟鞋。



論，將在下一部份中予詳述。

參、當代社會中次文化研究的演變

其實在許多CCCS的研究中，不同時代及社會的流行風尚就提供了他們許多的探討素材。例如從1950年代開始的teddy boys（泰迪男孩），經過1960年代的摩德族（mods）、搖滾樂族（rockers）及光頭黨（skinheads），到龐克（punks），就提供了Hebdige在《次文化：風格的意義》（*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1976）一書中的材料。但在CCCS所處的那個時代中，或說是動蕩不安、風起雲湧的1970年代裡，尚有單一、龐大的主流文化作為次文化的假想敵而存在，它可能是某些政治體系、某個宰制階級（我們甚至可以將之統稱為成人文化）；然而在現今的社會中，由於不同的次文化以及其他的社會組成之間有著「滲透性」的互動發生，加上形成主流文化的原因亦不再如過去那樣的單純——以往多半與「階級」有關，但現在可能夾雜著性別、族群、宗教、媒體及商業等許多因素，所以我們很難確認某種單一的主流文化就是形成對於青少年次文化壓迫的主要原因，而青少年次文化也同樣地難以確認他們究竟要去抗拒些什麼。

在這樣的情形下，CCCS對於次文化

的研究在後來學者的眼中，其實仍存有許多值得批判之處。延續著前面所提出的文化多元性的觀點，不少學者便認為CCCS理論中主要的假定就是認為包括次文化及母文化在內，基本上都是一體成形的（coherent）、同質性的組成（homogenous formations），是以他們往往很單純地作出二元的畫分——單一的主流（monolithic mainstream）與抗拒的次文化（resistant subculture）。但是CCCS的這種畫分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卻愈發受到考驗，在今日因著全球化而關係愈趨緊密的世界中，各種的觀念、風格、音樂、人群、科技與資本之間的流通及碰撞方式是以更複雜的方式來進行，而它們的數量與速度也是之前所無法想像的，遂使得所謂「次文化」與「主流」的界限之間產生了越界的情形（Weinzierl, etc., 2003: 7; Morley, etc., 1995）。

前述的越界情形亦使得CCCS次文化分析中所強調的政治動能（political agenda）逐漸失焦。雖然CCCS對於次文化的研究向來強調「抗拒」的政治潛能，惟按照Martin的說法，CCCS的理論固然為青少年次文化贏取了文化上的空間，但實則並沒有為附屬性結構位置（物質方面的條件）提出真正解決的方法，諸如失業、教育不利、無前途的工作、低收入、技藝的喪失等問題（Martin, 2002: 75）。



也正由於CCCS的解決方式是屬於文化的、想像的與象徵性的，故也有學者將CCCS中所強調的青少年次文化抗拒稱為「符號學的游擊戰」(semiotic guerrilla warfare) (Weinzierl, etc., 2003: 4)。而CCCS研究所進行的「游擊戰」，在資本主義昌盛、全球化的現代化社會中，更顯得無用武之地。依Weinzierl等人的分析，CCCS的研究向來就低估了次文化對經濟過程的參與，一些商品導向的次文化，如摩托車手(bikers)、滑板手(snowboarders)與衝浪板手(windsurfers)的文化，在一開始就具有消費主義的企圖心，而在今日，次文化更成為行銷自己身份或認同的有力助手。這些文化現象的改變可能都不是當年CCCS學者所能預見的。

除了次文化的政治功能或英雄模式(heroic model) (Weinzierl, etc., 2003) 逐漸失去其影響力外，CCCS的次文化研究過度固著於階級與年齡之上，也激發許多學者的再次省思。Besley即認為，固然CCCS重視了青少年邊緣化及社會調適的問題，但他們也易忽略了其餘的主角與分析的因素。比如他們可能過度浪漫化了某些青少年次文化，卻忽視了平常的孩子(ordinary kids)，這些孩子的生活可能是因其過度單調而未受青睞；過度聚焦於階

級及年齡，而忽視了其他變項，如性別與族群；又如他們的推論主要是建立在一小群的青少年（特別是勞動階級的男性），這就可能不自覺地反映了研究者自己本身的階級背景。Besley指出，CCCS將青少年次文化予以本質化，但忽視了女性的經驗，同時也過度強調宰制／附屬、表現／壓抑、正常／不正常之間的對立，這些都使他們未能注意到青少年的共通性、連續性以及主動選擇的能力 (Besley, 2003: 157)。此外，CCCS所忽略的重要因素，還有主流或流行媒體對於次文化建構自身過程的影響力 (Stahl, 2003: 29)，特別是在傳播媒體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中，媒體所傳佈的各種訊息，對於青少年應該都會造成深遠的影響。

從前述歸納的對CCCS的批評當中，可以發現到，其中有許多的批評都與當代社會的特性有關，例如1960、70年代高雅文化與通俗文化、主流文化與次文化的嚴明區別，使得CCCS選擇站在通俗文化及次文化的一邊，為傳統中被忽視的文化代言。但是從1980年代以來的當代社會，由於深受到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及後結構主義(post-structuralsim)思潮的影響，更進一步模糊了高雅／通俗，主流／次級文化之間的界限，所謂「文化」的

「符號學的游擊戰」一詞原先是來自於Hebdige對於Umberto Eco的借用 (Hebdige, 1979, p.105)。



內涵面臨到質變的局面。

依照Lyotard對於「後現代」的解釋，所謂的「後現代景況」(postmodern condition)，指的在廿世紀這個後工業社會(post-industrial society)中所發生的在科學、文學及藝術中「規則」(rules)的改變。這樣的改變，帶動了知識狀況的改變，進而質疑了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來有關真理、意義及解放的後設敘述(metanarrative)。Lyotard挑戰了那些權威性論述主張所謂「真理」的方式，這些權威論述通常是藉著禁聲、排他或壓制其他論述或知識的方式來主張自己的真理(Lyotard, 1992; Besley, 2003: 161)。簡言之，後現代的出現，使得人類各個知識領域原有鉅型的後設敘述，受到了嚴厲的挑戰；同時它也指出，在每一項真理、每一個論述的背後，其實都隱含著對於其他真理、其他論述的壓制；所有單一的「文化」形成的背後，其實都有著錯綜複雜的各種因素在糾結著。

後現代主義代表的是對於現代主義的質疑甚或否定，惟這種「否定」的精神實則在人類思想歷史中並不罕見，不過在當代的社會中，後現代主義卻因為加上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因素而更顯得獨特。「全球化」一詞在1980年代後期開始廣泛為人所討論，通常指一種具有多面向的歷史過程，其對人類可能同時帶來

正面及負面的效應。根據Besley的歸納，全球化包括了不同面向的相互連結(Besley, 2003: 162)：(一)經濟上一與跨國資本、外資、經濟及企業集中、勞動市場的鬆綁、管理與貿易的自由化等有關；(二)政治上一當代有一些現象與政治上的全球化有關，諸如民主化、邊界的關閉、尋求庇護者、移民、「非法」移民打工、日益增加的新自由主義、右派與基本教義派運動等；(三)文化上一則有混用語、「西方化」、「美國化」、流行文化與全球化有關；(四)傳播上一新聞、圖像與資料流動、網際網路、同步翻譯、航空旅行等。此外，尚有許多跨國性組織的出現加速了全球化的進行，諸如跨國企業(像微軟、Nike、麥當勞等)、國際性政府組織(聯合國、世界銀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以及非政府組織(NGOs)等。在加上這些全球化現象後，使得後現代主義的精神不再只是「否定」、「質疑」而已，還具有跨文化及邊界的「混種性」(hybridity)及F. Jameson所講的「商業化」在內——Jameson就認為我們今日的全球化不是一般的全球化，而是特定階段的全球化，是以後現代包裝的全球化。

全球化現象與後現代性交織在一起，再加上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ies)與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觀念，遂造就了當代社會的一個重要特徵——當我們在



討論後現代景況下的全球化中的生產（production）與文化現象時，必須要透過辯證性第三者——也就是商品化與消費來進行（Dirlik, etc., 2000）。Corrigan指出，人類在廿世紀時才出現了大量消費的現象，在現今的社會中，消費是當代社會的主要機制，而非生產（Corrigan, 1997: 1）。其實，後現代社會作為一個以消費為主的社會，影響所及，不只是社會中的個人重視享樂、滿足而已，更重要的是消費與整個經濟體系間具有結構性的連結，消費行為本身進而成為一種符碼化的記號體系（a coded system of signs），惟有透過這種記號體系，消費者之間才能相互溝通，甚至透過這種記號體系，個人之間才能決定彼此是相似的，還是差異的。此外，後現代的消費，也使得人們更強調身體與性的重要性，身體甚至也可以是一種商品（Besley, 2003: 163-164）。

於是，後現代在關於青少年的論述上發展出不同於現代性的論述，他們不再將青少年視為是一個普世性的生命階段，而是發展出來一種不同於以往傳統馬克思式社會學的論述，其中尤其是依循著Foucault的學說路線。依Besley歸納，包括Giroux及A. Lukes等人在內，就反對傳統社會學過度強調青少年邊緣化與疏離的說法，而認為後現代的研究取徑應著重於主體的、事情是如何被經歷的過程，而非

「客觀性的實在」（objective reality）。綜合來說，在後現代取向的論述中，主體被認為是由社會所建構的，他們對於傳統所謂「青少年」概念存疑；他們亦主張建構青少年文化要從兩方面作面，一面透過市場（作為發達消費主義的文化層面），另一方面則必須透過青年人本身的主動性（agency）（Besley, 2003: 164-165）。

總而言之，當代社會中所出現的後現代思潮，對於青少年次文化研究的影響，可以說是全面性的。「後現代」不僅成為當代社會的外在表徵，重要的是，「後現代」更常代表的是一套全新的思考及論述的方式。當我們透過這種思考及論述方式，去檢視社會中的文化實踐及權力關係時，或許會得到不同的對於文化及青少年次文化內涵的思考結果，進而產生不同的青少年次文化的研究取向。

肆、什麼是「後次文化研究」？

在「新的」後現代社會中，產生了一種「新的」次文化研究的取徑，有別於過去CCCS所作的次文化研究，Weinziel等人將其稱為「後次文化研究」。從名詞的形式上來看，後次文化研究與其他「後XX主義」等名詞不同的是，其並非「次文化」之後的研究，它的研究對象仍是「次文化」



(或是其他類似意義的各種文化)。後次文化研究中的「後」其實類似「『後』現代社會」中的「後」，其所代表的仍是「現代之後」的意思。簡言之，後次文化研究的出現與我們前面所講的「後現代」有著密切的關係。甚至於，我們還可更具體地說，後次文化研究指的是「後CCCS (伯明罕學派)的次文化研究」。

一、「後次文化」一詞的出現

「後次文化」一詞的出現可上溯至 Chambers 於 1987 年著作中的運用，Chambers 使用了「後次文化風格」(post-subcultural styles) 一詞於文體及音樂中的折中主義上。後來 Polhemus (1996) 與 Muggleton (1997) 分別使用了「後次文化」一詞，其中 Polhemus 將「夜店」(clubbing) 當成一種後次文化的現象，而 Muggleton 的論文乾脆就名為「後次文化者」(The Post-subculturalsim)。惟後次文化不僅代表一系列相關的出版作品，也逐漸形成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這還只是最近的發展。2001 年時維也納舉辦了一場名為「後次文化研究：流行文化中新的後次文化形成及其政治影響」(Post-Subcultural Studies: New Post-Subcultural Formations within Popular Culture and their Political Impact) 的學術會議，此次會議進而激發了 Weinzierl 與 Muggleton 等人所編輯之

《後次文化選集》(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 的出版 (Weinzierl, etc., 2003: 3-4)。

雖然「後次文化」一詞的出現要到 1980 年代晚期才出現，但是其實 CCCS 本身較後期的學者就已經開始將 CCCS 的工作作了某種程度的修正及拓展，從廣義的角度來說，他們也可說是某種程度的「後次文化研究者」。例如 Hebdige 與 McRobbie 就曾經將族群與性別的觀念融入其研究中，而 Redhead 等與曼徹斯特學派 (Manchester school) 或是曼徹斯特流行文化研究所 (Manchester Institute of Popular Culture, MIPC) 有關的學者對於「夜店文化」(clubcultures) 所進行的探討，對後次文化研究而言更屬重要文獻。Redhead 很喜歡使用「從次文化到夜店文化(s)」(subculture to clubcultures) (Redhead, 1997) 一語，因為其覺得文化條件十分複雜，但過去我們卻太常將文化化約為單一面向，故他認為從 1990 年代開始的年青人與流行文化，到現在的廿一世紀，其實都已經不能再適用於 CCCS 所使用的某些嚴格意義下的概念了 (Martin, 2002: 77; Weinzierl, 2003: 4; Wilson, 2002: 378)。其實類似的看法不獨 Redhead，包括 Hebdige 與 Chambers 亦復如是。Thornton (1995) 有關夜店與銳舞文化 (rave cultures) 的探討則是另一重要的文獻，她



一方面承認CCCS研究對其具有的影響，將自己的研究稱為「後伯明罕」(post-Birmingham)研究；另一方面也認為CCCS對次文化的定義在實際上並不可行。Thornton以為CCCS忽視了媒體在次文化形成過程的重要性，同時她也質疑了CCCS所謂的「真實性」(authenticity)是否真的存在的問題。

二、對於「次文化」概念的重新思索

除了文化的多樣性之外，與CCCS對於次文化的研究相較，後次文化研究者對於「次文化」概念本身的探討似乎要更為細緻些。例如Thornton並不如CCCS將次文化視為完全透明的，而是著眼於「次文化意識型態」(subcultural ideologies)的探討上，其認為流行文化之內也有層級存在，她因而探討了「次文化資本」(subcultural capital)的問題。Thornton基於Bourdieu區辨(distinction)的觀念，又重新回到芝加哥學派的理論基礎上，探討次文化之內的社會衝突與文化競爭的問題。此外，Thornton也討論了次文化政治(politics of subcultures)的問題，認為次文化政治中所假定的文化差異，並不必然是正面的與進步的(Martin, 2002: 78; Gelder, 1997: 148)。有些類似的是，Muggleton亦認為CCCS所使用的概念無法

運用於實證研究，在次文化的研究上其主張採取一種「新韋伯式」(Neo-Weberian)的觀點，更著重於次文化中個別成員的主觀意義。此外，Muggleton還認為後次文化者向來對於政治的議題並不特別關注(Martin, 2002: 78)。

Bennett (1999)也探討了「次文化」的概念問題，但其受到了Maffesoli影響，而喜用「新部族」(neo-tribe)一詞來代替「次文化」。Maffesoli認為，我們生活在「部族的時代」(the time of the tribes)中，我們親眼目睹了各式之生活型態的文化爆炸。在Maffesoli的用法中，所謂的「部族」是圍繞著商標名稱及角色扮演的幻想而組成，他之所以使用「部族」一詞，是因為舊有的概念如核心認同(core identity)、主體性、自律、甚至次文化，都無法解釋新的「社會性」(sociality)形式(Maffesoli, 1996: 76)。Maffesoli所建立的這種後現代架構對後續的次文化研究頗有影響力，因為他可以說放棄了現代主義中所謂的社會—結構性認同(socio-structural identities)，而改用意義較模糊之「部落組成」('tribal' formation)，以表示表示其中的流動性(Weinzierl, etc., 2003: 5)。Bennett同意，使用「新部族」一詞更能抓得住晚期現代社會的生活型態與認同的狀況，因為「新部族」一詞要比「次文化」更具有流動性(fluidity)與混



種性 (hybridity) (Martin, 2002: 79; Weinzierl, etc., 2003: 6)。「新部族主義……代表年青人音樂與風格偏好的變化性質，以及青年人文化團體流動的本質」(Bennett, 1999: 614)。

無論是「夜店文化」或是「新部族」的使用，都表達了當代社會中次文化的某種特性，它們與「次文化」一詞間，容或對某些學者來說有必要作出區別，但基本上它們仍是可以彼此相容，有時甚至於是可以互換的。例如夜店文化就是與消費有關，指涉了一整套的「品味」(taste)，而且是發生在某個特定的空間場景中；而「新部族」一詞也與空間有關，特別它所指陳的也是當代都會中的夜店場景 (Weinzierl, etc., 2003: 6)。這些都顯示了當代社會的次文化往往有其空間性、脈絡性，會隨著不同的場景而有所變化。這種對次文化之流動性甚至於揉雜性的強調顯示了後現代理論的影響，也代表了後次文化研究不再刻意強調應該有某種單一固定不變的青少年文化認同 (cultural identity)。此外還值得注意的是，從新部族或夜店文化的形成過程來看，新部族的形成是「選擇的」(elective or chosen)，而不是歸屬的或既定的，也就是說它不再像CCCS對次文化的看法，認為次文化是與階級緊密連結的 (class-bound)，這表示了次文化形成的過程中實則也包含了個體的主動

性與創造性在內。

三、後次文化研究中的不同流派

根據Weinzierl等人的說法，經過1990年代，許多青少年文化的研究者逐漸脫離CCCS對於次文化研究的記號學取向，而又重新回到注重民族誌及質的研究方法論的社會學研究上 (Weinzierl, etc., 2003: 9)，這也構成了後次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特色。Weinzierl等人還歸納了兩種次文化研究中的主要流派（此兩流派間並不截然互斥），其中第一個流派試圖擯棄CCCS的理論架構，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分析當代次文化現象的架構，由於此一流派的典範還未真正確立，所以呈現的是群雄並起的局面，其中特別是P. Bourdieu (1994)、J. Butler (1990, 1993) 與M. Maffesoli (1996) 的理論對於該流派有頗多的啟發。Weinzierl等人指出，在Bourdieu理論中一些概念諸如「品味」(taste)、「區辨」(distinction) 和「文化資本」等，透過Thornton的著作，進而成為當代分析青少年文化重要的概念。而Butler對於性別操演 (performativity) 的闡釋，也成為我們理解次文化認同建構過程中的重要基礎。至於Maffesoli，其所建立的後現代分析架構，對於青少年文化的分析亦頗有影響 (Weinzierl, etc., 2003: 5)。

後次文化研究中的第二個流派則要比



第一個流派更徹底些，因為它根本否定了要以次文化本身作為探究的目標。這個派別的學者認為，原有的「次文化」概念已經落伍了，無法抓到新時代不斷改變中的感覺與文化實踐，他們因而致力於創發新的概念。除了前述Redhead所提出的「夜店文化」、Bennett的「新部族」外，尚有A. Singh表示當代青少年團體時所使用的「頻道」(channels)或「次頻道」(subchannels)，而Weinzierl則使用「暫時性的支流網路」(temporary substream networks)一詞來稱呼青少年團體(Weinzierl, etc., 2003: 5-6)。事實上，不管是怎樣的名稱，上述這些名詞都和次文化一樣反映了部份的社會現實，也代表了個別學者對於當代各種次文化現象的觀察角度。雖然這些作者提出新的名詞時是為了強調後現代社會中文化的流動性、片段性與暫時性，因而主張以這些名詞取代「次文化」。不過若我們思及所謂的次文化只是相對於所謂的主流文化或母文化而言，也許次文化的意義應該不會如這些後次文化研究者所講的那麼僵化固定，而這些新的名詞也不會和次文化之間完全的互斥。

四、後次文化研究的特色

由於所謂的「後次文化研究」的發展由於是近年來的事，所以在研究的方法、取向及重要的主張上，目前都還呈現著百

花齊放、百家齊鳴的局面。雖然在理論的源泉上，它們都以後現代思想為其發展溫床，但是隨著透過不同理論工具的運用及結果的闡釋，不同後次文化研究學者的學說之間仍存有不小的差異，不同學者對於青少年文化的態度更可能南轅北轍。

例如同樣在面對當代的青少年文化時，McRobbie與Redhead的看法就截然不同。McRobbie在觀察了1990年代的青少年文化後，還是懷抱一種樂觀的態度，她將青少年的「尋求享樂」視為一種抗拒的方式，青少年之所以追求享樂，代表了一種對於其所處時代社會緊張關係的象徵性逃離(symbolic escape)。「如果我們暫時解構『抗拒』這個概念，移去其形上學的內容，……並且加入一種更俗世的、更微觀屬於日常生活實踐的層次……，那我們就可能看到這些次文化活動的維持、公開化與拓展，實際上是在文化的審美化條件下謀生的方式，它是對社會進行抗拒的一種特殊表現」(McRobbie, 1994: 162)。至於Thornton則描述了某些青少年如何藉著使自己成功融入那些排他性強的地下夜店／銳舞文化，獲得某種程度的「次文化資本」後，讓自己能自我強化。這些都是對於青少年文化抱持較積極樂觀看法的學者(Wilson, 2002: 378-381)。

但是Redhead與MIPC的看法在面對後現代及後龐克(post-punk)的1990年代的



青少年文化時，卻顯得較為悲觀及負面，他們認為這個年代的青少年文化的最大特徵就是「意義喪失」。在他們看來，那些所謂的『地下』文化形式其實與主流文化無甚區別，它們也無法透過風格與懷舊，傳達出某些震撼人心的訊息。Redhead甚至悲觀的宣布 (Redhead, 1990)，這就是「青少年文化的終結」(the end of youth culture)，因而主張我們必須要從「次文化」的古典概念步向一個更為激進、新穎的「夜店文化」或「後次文化」。類似的看法也可見諸Muggleton、C. Stanley 與S. Reynolds等人的觀點，其中Muggleton更認為後現代的次文化是「無政府的、虛無主義的與充滿煽惑性的」，在後現代底下的消費者既不會積極抓住機會，也不會進行批判，只是在那裡茫然地旁觀而已。

雖然不同後次文化研究者對於當代的青少年文化的態度不一，然而卻也都展現了他們與過往次文化理論的相通處。McRobbie所講的「尋求享樂亦是一種抗拒」的說法，其實就是CCCS次文化理論中所說的次文化成員會採取引人側目的風格來表達對於現況的不滿，只不過她作了一些較極端的發揮罷了；而Redhead等MIPC成員也是在批判當代的次文化概念失卻了「抗拒」的意義。而從更廣的角度來看，不論是McRobbie或Redhead等後次文化研究學者，其都注意到青少年在進行

文化活動時所具有的潛能，無論青少年是用以冷漠或被動的方式來因應，還是要以樂觀的與創造性的態度來運用賦權／抗拒的方式。這些在在都顯示了後次文化研究作為CCCS之後的研究，不僅具有與前代理論之間的關連性，而不同流派的後次文化理論之間也仍然有其共通的特色存在。

綜言之，在後現代與後結構主義的影響下，關於青少年次文化研究的焦點已有許多改變，例如過去的青少年研究重視勞動、就業及集體的階級文化經驗如何形塑青少年文化與認同的過程，但現在則將焦點置於日益增加的自主性與個人化經驗模式（植根於消費與閒暇）之上 (Cieslik, etc., 2002: 11)。在這種轉變下所形成的後次文化研究具有下列特色：

(一) 重新賦與「次文化」概念新的意涵，「青少年次文化」不再被視為普遍的、固定的與年齡或階級有關的概念。歷經了CCCS對次文化的研究，許多後次文化研究的學者在研究的方法論上又回歸到社會學研究方法，試圖在實際經驗世界中奠立次文化分析的基礎，而且次文化研究者更也強調特殊的、局部性的研究 (Gelder, 1997: 148)。而受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後次文化研究者也認為，次文化不再有所謂的「真實性」(authenticity) 的意義 (Muggleton, 1997: 198)。例如Muggleton即從後現代的角度論述了文化



意義的轉變，其認為在後現代的社會中，風格及視覺入侵了日常生活，而在這種日常生活美學化的環境中，不再有任何日用貨品存留，有的只有記號（signs），事物的價值由「使用價值」變成了「交換價值」，最後終於成為了「記號價值」。次文化的風格成為沒有任何原件的擬象（simulacra）與影本（Muggleton, 1997: 196; Stahl, 2003: 29）。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後次文化不再具「真實性」的意義，代表著後次文化中的次文化是與「階級」脫勾的，其與CCCS所探討的次文化不同。在後次文化研究者的眼中，由於次文化不再是與階級密不可分的，其亦可能涉及性別、族群、地域等因素，所以次文化往往是浮動多變的，也往往摻雜有各種不同的成分在內。

（二）後次文化研究者相信，次文化並非同質的、單一的整體，在次文化之內也有層級，亦有意識型態的存在，甚至還有文化資本的問題。在此，Thornton借用了Bourdieu文化資本的概念來討論次文化資本的問題，她認為在這個後工業的世界中，消費者常受到鼓勵要使自己更「個性化」，而權力的運作卻較似乎較喜歡進行分類和區隔，是以其實我們很難認定「差異」（difference）就必然是進步的（Thornton, 1997: 208）。Thornton亦評論了伯明罕傳統的CCCS過度政治化了青少

年的閒暇（youthful leisure），但卻忽略了在青少年閒暇之中進行遊戲時微妙的權力關係，她主張我們應對於次文化意識型態有所批判（Thornton, 1997: 201）。Thornton的學說當然只是後次文化研究中單一學者的觀點，惟她也提醒了我們不應以籠統對立的方式來界定次文化，否則就會忽略次文化之內的多元異質性，亦可能會對其中細微的權力運作關係視而不見。

（三）後次文化研究更強調媒體的重要性。在不少後次文化研究學者的看法中，認為CCCS假定了「無媒體的空間」存在，因而忽略了媒體真正的重要性（Wierziel, etc., 2003: 8）。即便部份CCCS學者曾提及媒體的作用，但也多為事後的（post facto）對於次文化的回應，也就是在次文化形成之後，媒體如何形塑主流霸權，將某些次文化（如龐克）當成「他者」。相較於CCCS，後次文化研究似乎更強調媒體在次文化形成過程中的作用。例如Thornton就主張媒體（包括電視、廣播、雜誌、小冊子、虛擬媒體如網路）是次文化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一部份，它們在次文化生成以及延長次文化生命週期的活動中都是扮演著重要的角色（Stahl, 2003: 31）。

（四）後次文化研究者認為當今的社會中，青少年不太可能再去抗拒某一特定的宰制階級或政治體系，而且所謂宰制階



級／附屬階級、主流文化／次文化之間的關係其實也更為複雜。後次文化研究者以為，CCCS的研究中有著明顯的政治訴求——那就是要去發現勞工階級青少年運動中的反叛形式（Weinzierl, etc., 2003: 7），了解青少年是如何透過對於成人社會所作出的回應來發展自身的次文化。後次文化並不傾向接受這種次文化的「英雄模式」。但事實上，後次文化研究也沒有完全脫離政治，誠如Thornton所分析的，次文化之內（甚至不同次文化之間）都存在著微妙的權力運作關係，這些都是研究者所不可能刻意忽略的。此外，在後次文化中仍有可能形成某些後次文化的抗議（post-subcultural protest formations），例如透過政治的動員及媒體的能見度，加上網路科技，就產生了大規模的反全球化運動（Kahn, etc., 2003）

（五）「選擇」（choosing）可以說是後次文化研究中相當重要的字眼。在當代社會中，任何一個次文化者都可以迅速、自由地從某一個風格轉移至另一個風格，而這種高度的流動性，可以說是遊戲性與愉悅的來源。對個人來說，選擇不同的次文化身分或認同並不會產生矛盾，因為已不再有所謂正確的詮釋存在（Muggleton, 1997: 198）。依循Kellner（1992）的邏輯，我們可以將後現代的次文化認同理解為多元的與流動的。這種流動的與多元的

次文化認同，固然顯示了次文化的「無根性」，但卻也可幫助我們從個人對於次文化認同的選擇過程中，重新找到個體的主動性與潛能。

在目前，所謂的「後次文化研究」尚不能構成一個嚴謹意義的「學派」，雖說後次文化研究主要論述的是「『後』現代社會」是「『後伯明罕』學派」的次文化研究，但它的研究並非要與伯明罕大學的CCCS或是更早之前芝加哥學派的次文化研究完全決裂，而是期待以更精細的眼光、更複雜的理論工具，對於新時代的次文化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容或在許多後次文化研究學者的眼中，次文化應該有著各種不同的「名稱」，但這並不表示在當代社會中，相對於主流文化的次文化實際上是不存在的，相反地，各式各樣的次文化及相關的名稱其實都或多或少反映了某種程度的社會現實。對後次文化研究者來說，他更關心的問題應該是：這些後現代社會中的次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媒體與次文化的形成之間究竟有何關連？個人又是如何經驗、看待這些次文化的？在次文化之中有著何種細微的權力關係在運作著？而這些問題的思考，對於教育工作者來說應該也同樣的重要。

伍、危機社會中的青少年文化



雖然後次文化研究的出現主要與後現代思想有關，不過我們在此還是暫行借用主張「第二現代」、「反省式現代化」(reflexive moderization)所提倡的「危機社會」概念(risk society)，提供省思當代青少年次文化時的一些社會基礎。

當代著名社會學家U. Beck與A. Giddens曾發展了一套「危機社會」的理論，來討論當代社會所面臨的種種問題，他們都將危機社會當成是晚期現代性社會發展的一個階段。Cieslik等人在其《危機社會的年輕人》(Young People in Risk Society)一書中曾對Beck及Giddens的危機社會理論作了下列的歸納(Cieslik, etc., 2002: 3-4)：

Beck認為當代危機社會的一個特點就是工業製造風險(manufactured hazards)的增加。人類為了追求財富所以進行工業生產，但生產的過程中卻產生許多危機，諸如環境污染、食品中毒等問題，伴隨這些危機所產生的不確定感隨著全球化而日益加深。此外，危機社會還有另一項特徵，那就是因為長期文化變遷——去傳統化(detraditionalization)所生的不確定感。這種不確定感意味著過去傳統指引人們的集體文化綱領不再發揮作用，它也反映在家庭、工作及社群生活的流動性上，遂使得個人化的認同有凌駕於集體綱領和傳統制度之上之勢。

至於Giddens則從時間、空間的轉變及其對於每個公民生活的影響來探討危機社會。他認為全球化資本主義(global capitalism)已經創造出了一個媒體化世界(mediated world)，在這樣的世界中，藉由資訊與傳播科技的媒介所進行的互動愈來愈頻繁，人和人之間面對面的互動卻也因之減少。而此一社會關係解體的過程引發了許多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信任」(trust)的問題。我們到底能不能信任不在我們眼前，卻又構成整個公民生活世界的其他個人？這種不安感的問題隨著Beck所講的「去傳統化」現象而顯得更複雜，那就在「去傳統化」的趨勢下，原先可預測的制度如家庭、工作、福利、社群也都變得具有高度的流動性與不可預測，遂使得不安感更深化為一種「存有的不安感」(ontological insecurity)。面對著危機社會中的不確定與不安感，Beck與Giddens都認為，人們無其他選擇，只能發展出更具「個人性的」(individualized)與「反省性的」(reflexive)的生命計畫管理方式來予以應對。

雖然「危機社會」的概念仍屬於現代性的理論之一，但是細察起來，Beck與Giddens對當代社會的描述與所謂後現代的景況其實有頗多共通之處。例如，當代社會除了是一個全球化資本主義的社會外，也是一個文化傳統不再牢固、舊有社



會制度搖搖欲墜，並且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社會；當代社會在已然成為一個媒體化的社會，在其中，資訊與傳播科技愈發重要，而由媒體所製造的符號價值與虛擬人際互動甚至更有取代使用或交換價值和真實人際關係之勢。此外，當代社會愈來愈注重個人化，個人也有愈來愈多的空間來創造更複雜的主體性與生活型態。最重要的是，當代社會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感與不安感的「危機社會」，在這個「危機社會」下生活的人們，面對著各種的不確定性與不安全感，人們惟一能作的，就是反求諸己，發展出來更具有彈性及反省性的個人「生命計畫」，來因應危機社會的來臨。

筆者認為，在危機社會的概念之下，當代青少年次文化呈現了下列的特徵：

（一）由於文化傳統不再牢固，家庭、工作及社群生活的流動性日益增多，部份青少年次文化有可能不再固著於階級之上，卻更多地與其所從事之活動的場景、空間產生關聯。例如所謂的「銳舞文化」（rave culture）就是以電子舞曲的派對作為場景，參加銳舞的青少年重視的是社群感，不同於前代青少年文化以階級特性作為訴求的是，他們強調的是平等地交往、開放及自由表達。（二）由於其與階級的「脫鉤」，加上商業化及資本主義的推波助瀾，遂使得青少年次文化的形成更多地與消費行為（而非生產行為）有關，

許多青少年常是透過消費行為模式的建立（如購買某一類名牌或手機）來追求自身及群體的認同，形成各自的青少年次文化。另外，雖然消費行為的塑造多半來自商業或流行文化的影響，但是個人「享用」消費的方式仍然與個人的「選擇」有關，也使得當代的青少年次文化有著更多個人自我表現的機會。（三）傳播媒體及資訊科技的普及，加強了不同階級、團體青少年之間交流的機會，例如透過密集的媒體宣傳，可以在短時間內號召一場人數眾多的大型演唱會；而網路的興起，也促成所謂「快閃族」的出現。此外，大眾媒體的發達，亦使青少年接觸不同文化經驗的機會增多，現今許多所謂的「哈日」、「哈美」、「哈韓」的風潮，正可以說是傳播媒體高度發展下的產物。（四）儘管不同青少年交流的機會增多，但其成員的連結卻往往是暫時性的，例如前述的「快閃族」，經號召後在某個特定場合集合亮相，之後很快便一哄而散，並無法形成真正具有向心力的凝結，其抗爭力道往往也不會過於持久。加上在現今的多元社會中，所謂主流文化或宰制意識型態並不明顯，這使得青少年的反叛的目標，很少是針對龐大的主流體制進行長期的抗拒，而多半是針對某些單一的議題而發（例如ADSL費用的漲價）而發。青少年次文化中所流露的「抗拒」意味並不特別強烈。



(五) 當代的青少年次文化往往並非單一、同質性的整體，而是多元、異質的，它不是固定的，更多時候可能是流動的。有時，在同一個次文化之中，亦會有不同階層的存在，而有所謂次文化意識型態或次文化資本的問題發生。換言之，擁有較多次文化資本者（如消費能力較高、社交能力較強，乃至舞技較好握）在青少年團體中往往具有較高的地位。(六) 雖然當代青少年次文化與前代有諸多差異之處，然而不同時代的青少年次文化之間其實還是會有相通之處，那就是對於成人社會的不信任感及對於社會未來和個人前述的不確定性。我們只能說，在當代社會變遷更為劇烈的危機社會中，這種不信任感及不確定感恐怕是更為嚴重的。

陸、結語——後次文化研究對教育工作者的啟示

借用Besley的話來說，後現代社會中的青少年文化是「混種的」而又「全球化的」(globalized) (Besley, 2003)。青少年文化之所以是「混種的」，在於它除了會結合本土的與全球的文化特質之外，也會注意到空間與文化位置之間的相互關連，所以它不可能像傳統社會中的青少年文化一樣單純、同質。另一方面，青少年文化之所以是「全球化的」，在於在這樣一個

傳播媒體高度發達、全球化資本主義盛行的社會中，青少年文化的形成一定會受到全球化傳媒經驗與跨國企業商業宣傳的影響。Besley進一步說，在前述文化環境下成長的青少年，可以說是「混種的世界孩子」(hybridized world-kids)。

這群「混種的世界孩子」，除了是教師前所未見的「新品種」外，他們還有著教師所未能擁有的技能與知識。Giroux曾描述當今教師及學校所面對的一個窘境——那就是最新的資訊與傳播科技，已經創造出一種學生對於學校的疏離感及無聊感，學校已經無法與這些最新科技競爭 (Giroux, 1990)。教師形象不再是全知全能的，傳統教師的權威也因而飽受威脅。以Giroux與McLaren等人為代表的批判教育學 (critical pedagogy, 或譯為批判教學論)，面對著前述新的教育及文化情境及所產生的困境時，其因應之道是「將學生本身的問題與需求當成教育的起點」 (McLaren, 1989: 226)，他們主張，教師必須注意到學生是如何去主動建構意義的範疇 (categories) 的過程，因為這些意義範疇往往就顯示了學生產生知識及回應課堂知識的方式 (Giroux, 1992: 181)。

而從後次文化研究的角度來看時，重視學生本身的問題及需求、注意學生主動建構意義的過程固不可少，在面對著學生或青少年次文化所具有的豐富意涵時，更



不可掉以輕心。首先，教師必須更注意到青少年建構自身主體及次文化的過程及方式，這種意義建構的過程可能超越了傳統學術論述的範圍，所以教育工作者必須以更廣闊的心胸接納不同的探究青少年次文化的各種理論觀點（例如前面所提及的Bourdieu等人的理論，甚至包括Foucault對於「權力」的論述，以及多元文化如女性主義的觀點等），而且不再以傳統的心理學或社會學的概念來將青少年予以歸類或貼上標籤。另外，針對次文化中所可能有的次文化意識型態與次文化資本的問題，教育工作者也應該進行更深入的探討與分析。簡而言之，我們需要對於當代的青少年次文化的現象及內涵有著更細緻的分析及論述。

其次，身為一位教育工作者，亦應該正視青少年的生活、希望、恐懼，了解青少年們在面對現在和未來時所感受的不安全感（Besley, 2003: 173），不再只是以「草莓族」等負面字眼，反映自己「他們這一代不如我們這一代」的心情，而應該將心比心，如此才能體會到某些青少年次文化中所要傳達的深刻訊息。再者，教育工作者也必須正視傳播媒體與資訊科技發達在形成學生次文化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重視媒體與青少年次文化之間的互動關係。面對著強勢的媒體及流行文化，教師可能不宜再以「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觀念單一面向來解釋傳媒及流行文化對於學生心靈或情感結構的宰制，而應該留意到，其實在與媒體的互動中，學生也有著自我表達與想像創造的主體空間。教師應該要保護、鼓勵這樣的空間存在。

不過反過來說，教育工作者也應該注意到部份後次文化研究者所提醒的當代青少年次文化中所可能產生的「意義喪失」的問題，面對著層出不窮、一再推陳出新的青少年次文化，教師仍應保有適當批判的能力，洞察某些青少年次文化所流露的「虛無主義」茫然心態，適時與青少年進行對話與討論，喚醒青少年本身具有的批判反省意識。畢竟在師生關係中，作為一個成人文化的代表者，教師背後仍有其文化的傳統及價值標準存在，教師還是應該要堅信，透過其與青少年的交流，青少年將可以增加與社會文化傳統的接觸機會，減少他們內心因著失根所產生的存有不安感。

總而言之，後次文化研究所帶給教育工作者的最大啟示，在於其解構了次文化原有的單一性、同質性，告訴教育工作者，青少年次文化的形成除了階級的因素之外，還有更多的因素（如種族、性別、商業、媒體等）亦發生了影響作用。面對著新時代、新社會的來臨，面對著更新穎多變的青少年次文化，我們需要以更新的



思維與更多的努力，來面對我們的孩子。

參考文獻

- 李亦園 (1984)，當前青年次文化的觀察。**中國論壇**，205，9-15。
- 陳奎熹 (1997)，**教育社會學研究**。臺北市：師大書苑。
- 王志弘、李根芳 (譯) (2003)。Brooker, P. 著。文化理論詞彙 (A glossary of cultural theory)。臺北市：巨流。
- 楊祖珺 (譯) (1997)。O' Sullivan, T. 著。**傳播及文化研究主要概念**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臺北市：遠流。
- Barker, C. (2000). *Cultural studies —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Sage.
- Bennett, A. (1999). Subcultures or Neo-tribes?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th, style and musical taste. *Sociology*, 33(3), 599-617.
- Besley, A. C. (2003). Hybridized and globalized: youth cultures in the postmodern era. *The Review of Education, 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25, 153-177.
- Chambers, I. (1987). Maps for the metropolis: A possible guide to the present. *Cultural Studies*, 1(1), 1-21.
- Cieslik, M. and Pollock, G. (Eds.) (2002). *Young people in risk society*. Hampshire: Ashgate.
- Cohen, P. (1972). 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y. *CCCS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2, 5-53.
- Cohen, S. (1987). *Folk devil and moral panics*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 Corrigan, P. (1997). *The sociology of consumption*. London: Sage.
- Dirlik, A. and Zhang, X. (2000). Introduction: postmodernism and China, in Dirlik, A., etc., (Eds.), *Postmodernism in China* (pp.1-17).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Gelder, K. (1997). Introduction to part three. In Gelder, K., etc., (Eds.), *The subcultures reader* (pp.-148). London: Routledge.
- Giroux, H. (1992). *Border crossing: Cultural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education*. N.Y.: Routledge.
- Giroux, H. (1990). *Curriculum discourse as postmodern critical practice*. Greelong: Deakin University Press.
- Hebdige, D. (1979).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Routledge.
- Kahn, R. & Kellner, D. (2003). Internet subcultures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 In Muggleton, D., etc. (eds.), *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 (p299-313). Oxford: Berg.
- Kellner, D. (1992),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ostmodern identities. In Lash, S. &



- Friedman, J. (eds.). *modernity and identity*. Oxford : Blackwell.
- Lyotard, J.-F.(1992). *The postmodern explained to children: Correspondence 1982-1985*.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 Maffesoli, M. (1996).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 London: Sage.
- Martin, G. (2002). *Conceptualizing cultural politics in subcultural and socail movement studies*.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1), 73-88.
- McLaren, P. (1989). *Life in schools —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pedagogy in the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 N. Y.: Longman.
- McRobbie, A. (1994). *Postmodern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Morley, D. and Robbins K. (1995). *Spaces of identity: Global media, electronic landscap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London: Routledge.
- Muggleton, D.(1997).The post-subculturalist, in Redhead, S., etc., (Eds.), *The clubcultures reader: readings in popular cultural studies*. Oxford: Blackwell.
- Polhemus, T.(1996).*Style surfing: What to wear in the 3rd millennium*. London: Thames & Hudson.
- Redhead, S. (1990).*End of the century party: Youth and pop towards 2000*. N. Y.: St. Martin's Press.
- Redhead, S. (1997).*Subculture to clubcultures: An introduction to popular cultural studies*.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 Stahl, G. (2003).Tastefully renovating subcultural theory: Making space for a new model. In Muggleton, D.,etc.(Eds.), *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 (pp.27-40). Oxford: Berg.
- Storey, J. (1993). *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Prentice Hall.
- Thornton, S. (1995). *Club cultures: Music, media and subcultural capital*. Cambridge: Polity.
- Thornton, S. (1997).The social logic of subcultrual capital, in Gelder, K., etc.,(Eds), *The subcultures reader*(200-209). London: Routledge.
- Weinzierl, R. and Muggleston, D. (2003).What is 'post-subcultrual studies' anyway? In Muggleton, D.,etc.(Eds.), *The post-subcultures reader* (3-23). Oxford: Berg.
- Williams, R. (1983).*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rev. Ed.). N. 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son, B. (2002).The Canadian rave scene and five theses on youth resistance. *Canadi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7(3), 373-412.

收件日期：2005年7月19日

修訂日期：2005年10月6日

接受日期：2005年10月7日